

2000.9.20

论中西诗学之比较—《比较文艺学》导论
饶芃子

中西艺术真实观之比较
蒋述卓

中西小说叙事的时空意识
张世君

中国翻译文学史：实践与理论
谢天振

哈贝马斯：“实践理性”和“社会化主体性”
章国锋

思 想

思想文综：NO. 3 THINKING

批判与反思—论哈贝马斯的方法论
曹卫东

关于DIFFERENCE的考释
丰 林

从“气韵”的生成检讨画论与文论的关系
邵 宏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
曹卫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文综 (第三辑) /饶芃子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12
ISBN 7-81029-742-2

I . 思…
II . 饶…
III . 文学评论和研究
IV . I206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石牌 510632)

暨南大学印刷厂印制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270千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18.00 元

目 录

1/论中西诗学之比较

——《比较文艺学》导论

饶凡子

15/中西艺术真实观之比较

蒋述卓

33/中西小说叙事的时空意识

张世君

67/中国翻译文学史：实践与理论

谢天振

89/哈贝马斯：“实践理性”和“社会化主体性”

章国锋

112/批判与反思

——论哈贝马斯的方法论

曹卫东

150/关于 difference 的考释

丰 林

175/从“气韵”的生成检讨画论与文论的关系
邵 宏

193/论陶渊明的回归意识
刘绍瑾

204/契机、机制、途径：论“中国文论话语”的生成
——从王国维的审美批评实践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李凤亮

231/读者：寻求“对话”的理解
——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的接受研究
陈丽虹

242/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著 曹卫东译

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论文摘要选登
269/语词与实在——中西传统诗学的言述空间与入思方式
余 虹

292/论动态结构中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王列生

304/语言与沉默
——文学写作中的空白结构
费 勇

319/文心探微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

林 岗

334/复古与复元古

——比较儒道美学的一个重要基础

刘绍瑾

353/编后记

论中西诗学之比较

——《比较文艺学》导论

饶芃子

“诗学”作为“文论”、“文学”的原初状态，是来自西方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古典文论。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亚里斯多德生前著作很多，如《工具论》、《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论灵魂》等，涉及的领域很广，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的文艺理论，在不少著作中均有所触及，而专门研究文艺问题的，今传有《诗学》和《修辞学》。在《修辞学》中，他运用心理学来研究修辞和雄辩，开了后世文艺心理学的先河。《诗学》是一部未经整理的讲稿，他在这一著作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包括诗的起源、诗的历史和诗的特征。当时古希腊的文艺主要是由戏剧（重点是悲剧）、史诗以及抒情诗构成的，亚里斯多德在分析悲剧的基础上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研究，探讨文艺规律。所以他在《诗学》中论的不是狭义的诗的技艺，是包括戏剧、诗歌、批评在内的文艺理论。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研究文艺理论的著作都称为诗学。我

们这里所说的“诗学”，指的也不是狭义的“诗”的学问，而是广义的各种文学的学问和理论，即对文学的理论研究和科学探讨，也就是当今学术界所说的“文论”、“文艺学”。本书所论的中西比较诗学各题，是我们近几年来对中西文论中具有可比性的若干文学理论问题范畴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对目前诗学现状和未来前景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中国诗学根基的有意识的寻找。

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学学科上所讲的诗学，都是沿袭西方的；所使用的概念、范畴、观念、原理，绝大多数都是“舶来品”，实际上是存在一个中国“缺席”的问题，或者说，在这个领域里基本上是“欧洲中心论”统治着，我们所熟悉并且不断在传授的诗学，并非是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诗学。本世纪后半叶，随着世界上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第三世界的崛起，“欧洲中心论”也随之而动摇，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在文化发展上要摆脱原先的局限，必须重视文化的外求和横向的拓展，为探讨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模式，实现全球共享，必须重视“他种”文化的研究，要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种”文化。在西方还是“欧洲中心论”的时代，东方文化在西方被当作是“他者”和“非我”，处于被压抑、受排斥的地位。现在在新的文化形势下，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任何体系和中心都是相对的，一个文化体系要发展，同样也需要外求，西方文化外求的参照系主要是东方，而东方文化要确定自己本土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使它为人们所认识、所接受，也需要以发达地区文化为参照，求得自己的发展和更新。面对东西方文化必然交汇的前景，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在未来的21世纪，人们研究的目光将转向全球。为此，诗学学者如何从本学科的现实出发，建立新视野，以开放的态度，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诗学研究，特别是对欧洲文化区域以外的诗学进行有深度而非盲目欧洲中心式的阐释，认识、探讨各类不同文化框架中

的普遍文学现象，有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共同拥有的“诗意表达”等，谨慎探索这方面前行的途径，建立一种具有真正世界性的诗学体系和理论，应是我们在面向 21 世纪时必须去面对的问题。

由于东西方文化、文学有极大的差异，有很不相同的质素，要建立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诗学，就应有东方各国诗学学者的参与，去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因为现在形成的诗学框架并不是建立在世界整体的文学研究基础上，而是以西欧的文化、文学作为基点，忽略了许多遥远的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文学，却又用这个本来未能涵盖它们的狭隘框架去框定它们，这就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要建立一种“为整个人类走向大同之域”（季羡林语）的“诗学理想”有很大的距离。在东方，中国的文化、文学不仅是源远流长，而且独具特色，在诗学范畴和观念以及入思的方式上，都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这就使处于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诗学学者，难以进入其中，彼此的互相印证也十分困难，中国的诗学学者如能摆脱过去比较封闭的思维模式，用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以西方的诗学为参照，打通中西方诗学之间的那堵“墙”，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是寻找本民族诗学在世界诗学中的地位，一方面是去发现本民族诗学和世界上其他民族诗学之间的“同质”因素，这对中国诗学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诗学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

在世界比较诗学的研究史上，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关于如何比较研究中西诗学，我国的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等一批著名学者，都曾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作出过一定的贡献。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日益蓬勃地展开，并且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但在我们看来，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的“诗学对话”尚未真正开始。比较文学的真义就在于跨文化、跨国别、跨学科，越

来越趋向于多文化的文学总体研究，正如韦勒克所说：“比较文学是一种没有语言、伦理和政治界线的文学研究”，因为“一切文学创作和经验是统一的”^①。正是文学中的统一、共同的东西，使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具有一种互相对话互相比较的可能。诗学作为反映着不同文化、文学精髓的聚焦点，它们之间的相互比较和对话也同样是必要和可能的。当然，这种比较不是以一种诗学模式去套另一种诗学，也不是用一种诗学模式去“攻克”另一种诗学，而是突破各种界限，作“文心”上的沟通，把握异中之同，了解同中之异，从中概括出更具有总体性和规律性的东西。

早在本世纪 60 年代，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伯勒就说过：“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②现在，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已备受关注，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难在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把握。在这方面，美国著名华人学者刘若愚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刘若愚 1975 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学理论》，从探求东西方超越历史文化差异的世界性文学理论出发，在介绍中国自成传统的文学理论的同时，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把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艺术四要素理论加以改造，用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把中国古代文论分为形而上的、决定的、表现的、技巧的、审美的、实用的六种理论，力图从中整理出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一个分析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理论框架。他还分别从纵向和横向考察了上述六种理论的出现、发展和相互关系与作用，并将其与西方相似理论作比较。他在运用现代的、理性的眼光清理解释中国传统批评理论的特点时，清醒地看到了自己面对着的种种困难，如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所用术语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诗化特性等，这些常常使人难以领会其确切的意义，在西方文论中也很

难找到与它们具有相同涵义与等价的术语和概念。为了揭示和辨别潜藏在某一术语中的某种潜在概念，寻求更精确的意义，他提出要注意每个术语运用时的上下文答案，考虑批评家的基本思想倾向，他所举的例证“以及他对同一术语在文学批评和其他著作中早期或当代的用法等等”^③，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意见。他在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与西方相似理论作比较时，也是先从纵向探究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源和流，在这一基础上才从横向作进一步的考察比较，如书中对中国的玄学论与西方的模仿论以及表现论异同的比较，就不仅清理、解释了中国玄学论的流变及其特点，又揭示了它与西方的模仿论和表现论的某些相通之处。由于中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可比的文论在中国和西方往往不是同时产生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很难在历时的方向展开，所以这种以共时研究为基础，打破时间先后次序，在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总体范围内进行某些问题的综合性的比较，应受到我们的特别注意。

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一章“导论”中曾阐明他写这本书的终极目的：

我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从源远流长、而基本上是独自发展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学理论，并进一步使它们与源于其他传统的理论的比较成为可能，从而对一个最后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式有所贡献。我相信，对历史上互不相关的批评传统作比较研究，例如对中国的批评传统和西方的批评传统作比较研究，在理论的层次上比在实际的层次上会有更丰硕的成果，因为特殊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对于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且某一具有自身传统的

文学的批评标准，也不能应用于其他文学；反之，对于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的比较，则或许能揭示出某些批评观念是具有世界性的，某些观念限于某些文化传统，某些观念只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反过来这又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因为批评概念通常是建立在实际的文学作品基础上的）哪些特征是所有文学所共有的，哪些特征限于用某些语言写成、或产生在某些文化传统上的文学，哪些特征是某种特定的文学所独有的。因此，对于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所有的文学。^④

可见，作者撰写这本书，立意是很高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终极目的是要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形成作出贡献。他在书中提出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观点，应是当今诗学工作者的一个共同的“理想”，它可以牵动人们去作各种各样的尝试，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去做。在我们看来，刘若愚这本书的突出贡献在于：他能用一种跨文化的眼光，以今天更发展了的科学文艺理论，来清理中国的传统文论，探讨、剖析那些暧昧朦胧的术语，展示其蕴含着的艺术理论，在与西方文论的比较中，提出了益人心智的精湛见解。这是只有“单文化”眼光的学者所不能做到的。

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著名华人学者叶维廉也有多方面的成果。我们读他的论文集《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⑤，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探讨下列两个问题：一是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也就是力图在跨文化、跨国别的诗学之间，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另一是试探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被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引起的危机。他认为，在欧洲文化系统里，寻找共同的文学规律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不存在“批评模子中美学假定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而是

比较文学研究，对象及范围的问题”。由于在欧洲文化系统中进行比较诗学研究，是单一的文化体系中的比较，得出的艺术原则，不一定适合各种不同文化系统中的文学，无法构成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美学据点和批评模式。但长期以来，“不管在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领域里，批评家和学者们都往往以一个体系所得的文化、美学假定和价值判断硬加在另一体系的文学作品上，而不明白，如此做法，他们已经极大改变了、甚至歪曲了另一个文化的观物境界”^⑥。为了避免这种“垄断的原则”（以甲文化的准则垄断乙文化），不再重犯这种歪曲本源文化美学观念的错误，他提出应重视对各种不同文化系统的理论作比较和对比研究，特别要重视中西方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做到互照互对、互比互识，以开拓更大的视野，互相调整、互相包容。这样做，既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世界上有许多源于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和不同的美学假定；也让中国读者了解到儒、道、佛的架构之外，还有与它们完全不同的观物感物程式及价值的判断。他也借用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有关作品形成的四要素，即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为条件，再加上自己所认识的新的要素，打破艾氏从西方批评系统演绎出来的四种理论（模拟论、表现论、实用论、作品自主论）的架构，而根据作品产生前后状况，总结出“五个必需的据点：（1）作者。（2）作者观、感的世界（物象、人、事件）。（3）作品。（4）承受作品的读者。（5）作者所需要用以运思表达、作品所需要以之成形体现、读者所依赖来了解作品的语言领域（包括文化历史因素）”。他认为在这些据点之间，有不同导向和偏重所引起的理论，从大的方面看有下列几种：（1）观感运思程式的理论，（2）由心象到艺术呈现的理论，（3）传达目的与效用的理论，（4）读者对象的确立，（5）传达系统自主论（语言），（6）作品自主论，（7）起源论。以上是叶氏提出的新的理论框架的建构。

在国内，曹顺庆著的《中西比较诗学》^⑦，是我国文艺理论界第一本系统研究中西比较诗学的专著。他按我们现行的文艺理论框架，从艺术本质论、艺术思维论、艺术风格论、艺术鉴赏论四个方面，对中西方相应的文论进行比较研究，侧重点则放在长期被西方忽略的中国传统文论上，在比较中着重是对上述四个方面的古代文论进行纵向的梳理和横向的阐明，眼光和视野已超出了本国的文化系统，这就使他所阐发的理论具有创意和特色。

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⑧，是90年代以来在国内有影响的诗学著作。这部书打破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诗学论述的基本模式，面对中西比较诗学存在的特殊困难，为了跨越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给予文化背景的比较以“非同一般的重视”，并且以此为前提和起点，确立全书的结构，由文化背景比较进展到范畴比较，把“诗学范畴作为诗学观念的‘网上纽结’”^⑨，从而展开中西诗学影响的事实比较。全书由背景比较、范畴比较、影响研究三编组成，这显然是一种新的探索，它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倡导以跨文化的比较方法，来寻求中国诗学自我超越的途径和前景。

在国别比较诗学方面，有狄兆俊著的《中英比较诗学》^⑩。该书以西方文论中的实用理论和表现理论为框架，把中英两国相对应的诗学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建立中英诗学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功用诗学和表现诗学，并且分别探索中英诗学二重性的内涵，以无用和有用、功利和超功利、客观和主观三个方面来展示中国诗学二重性内涵；以主观和客观、教育和怡情、情感和理智来展示英国诗学二重性内涵，并从中英诗学二重性探索其共同的规律和特殊的规律，为进一步探索诗学深层结构开辟了新的蹊径。该书在西方文论的参照下，对中国传统诗学（如道家审美理论中的表现理论等）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但能给人启迪，能引起人们去思考和探索。此外，

朱徽编著的《中英比较诗艺》^①，对分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中英诗歌，在艺术技巧和语言特色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之处，寻求“契合”点。作者用现代批评理论作为指导，把中英诗歌放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中和横向的不同文化的观照中进行观察分析，对中英不同诗艺技巧作比较研究，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分别比较研究中英诗艺中的格律、修辞、描摹、通感、象征、张力、复义、意识流、用典、悖论、想象、移情、变异与突出、汉诗英译中的语法、中英十四行诗等问题。下篇主要是比较研究中英著名的诗人、诗作，许多见解独辟精到。由于作者视野比较开阔，能从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对照、比较以及相互交流、影响的角度，去认识、概括中英的诗艺，特别是中国的传统诗艺，这就为跨时代、语种、民族界限的诗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层面。

如上所说，中西诗学比较，在中国学界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这种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比较，确实难度很大，现在，中西学者都注意到要寻找能解释东西方文学的文艺理论框架，注意研究欧洲文化区域以外的诗学体系、现象，为创建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诗学在作各种各样的探索。中国古代文论源远流长，而且在东方很有影响，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应是世界比较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尽管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如果我们能在文化思维上“打破垄断”，从双方出发，以开放的、平等的、兼收并蓄的态度进行研究，而不是以一种体系的理论原则去套另一种理论体系，是可以进入共相研究的，也可以日益靠近我们所寻找的真正具有全球性诗学框架的理想。

中西比较诗学的先行者早就指出，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难度很大，进行这种比较必须对中西文论都有相当的了解。西方文论，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经过长期的发展，文学的概念、范畴，一般都有严格的科学内涵，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

历史也是非常清楚的。比之西方，中国古代文论专书不多，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少数人做的事情。中国古代的文论家，比较多是凭借传统的理论和个人的体验来评论作品，他们的志趣主要不在于探讨深奥的哲理，而在于总结经验，阐明自己对文学创作的具体看法和主张，而且多采用评点的形式，生动活泼，常常是通过隽永的比喻、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这种理论形态带有直观性、经验性的特点，重体会，讲究妙语，往往不把话说尽、说死，理论观点和美学见解都是自然地在批评话语中表现出来，观点、见解随作品流动，只有读过作品的人，才能深刻理解它，如果没读作品，就难以领会其中的道理。有的理论是“诗化”的，鉴赏式的，带有一定的虚拟性，要弄清楚它，还得反复琢磨和借助想象，所以理论的效果经常是评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中国古代的文论，同西方的科学型文论不一样，更多是艺术化的，它的体系是潜在的。这样的理论是需要“解读”的，而要准确地“解读”，又十分不容易，首先是要对它作历史的“还原”，历史的“还原”必须建立在资料搜集和积累的基础上。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我国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已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我们拥有的是一座丰富的理论宝库，要拿它同另一种形态的理论作比较，使其有可能“相遇”、“对话”，还要寻求一种彼此沟通的渠道。

重要的是要构搭“相遇”的“桥梁”和寻求“对话”的“中介”。

中西异质文论有许多难以沟通和相互理解的因素，因为彼此都难以摆脱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框架。但中西文论都是人类文艺实践经验的结晶，必然蕴含有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共同性，应是异中有同，所以可以通过比较，从表面差异很大的中西文论中寻找它们的共同规律。困难在于：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大多是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来体现理论内容的，言简意

赅，理论的弹性较大，许多概念、范畴，如意境、形神、文气、风骨等，不但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同一内涵的表述的概念有时也很不一样。所以就要在“还原”的基础上对它作一番“破译”的工作，以当代话语进行新的解读，再将其同西方文论作比较，在比较中寻找中西文论的“同”和“异”，做到“借异而识同，借无而得有”，找出文学的共同规律，也认识各自的特点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文学的特殊规律。

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彼此差异的跨度很大，要相互沟通、理解很不容易，故要有“对话”的“中介”，即找出一些文学创作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互证互对，互比互识，在比较中看中西方文论家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形成怎样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有哪些“同”和“异”，从而进一步实现中西诗学的互识、互证、互补。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美学思想的结晶，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已有不少外国汉学家著文阐明它在世界诗学中的特殊地位和理论价值，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西方的学者要真正跨越文化，把握它的实质，困难仍然很多，所以要使中国的传统文论能够走向世界，与各民族诗学交流、比照，在相互汇通的过程中，共同熔铸出新的诗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可以使诗学进入世界和现代性的新阶段，中国的诗学研究者应肩负起更多、更重的责任。当然，这种世界性诗学理想的实现，应是一种开放的、“将成”的、不断变化发展而又多元共存的群体的探索，我们只能从“我”做起，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方法，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上，努力去探索“自己”谨慎前行的途径。

近几年来，我们就中西诗学中的若干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形成了这部 20 多万字的著作《比较文艺学》。全

书除导论外，共分上、中、下三编凡十章。上编“中西文学观念比较”，主要对中西文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如自然观、真实观、创作观、功用观等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中西两大文论体系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异同。中编“中西文论形态比较”，是对不同类型文学理论的比较，中西方文学理论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形态，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对文学的哲学形而上学的理论，本编主要是从中西叙事理论、中西抒情理论、中西形而上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在中西叙事理论比较中，着重从中西方叙事理论的传统——诗史之分：志与事、一般与个别；中西叙事理论的不同特征——文史哲：历史旨趣与哲学意味；文学叙事：理与事、文与事；作为文学叙事的历史与哲学等方面论述中西叙事理论的异同。在中西抒情理论比较中，着重是从心性设计、理性与情性的冲突、共论与表现论诸范畴之比较，作为心学和心理学的中西方抒情诗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在中西形而上理论的比较上，主要是从形而上学与中西形而上理论的相关性、中西形而上文论的主要形态、中西形而上文论的内涵三个方面进行描述、分析和阐明。下编中西文论范畴比较。由于中西文论中理论范畴众多，每个范畴都有其独特意义，在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有的具有可比性，有的不具有可比性，在本编中我们只选取其中具有可比性的五对范畴——神思与想象、雄浑与崇高、比兴与隐喻、虚静与迷狂、教化与净化进行比较，同时力图对有关问题作出较深刻的阐释。

本书研究的命题与时下已有中西比较诗学成果的区别是：

第一，注重各个论题自身“理论依据”的反思和说明，力图打破“垄断”，克服“随意性”。

第二，从中西方不同文化出发，注重中西诗学视野的融合，坚持研究者跨文化的“诗学主场”，纠正比较诗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也防止“中国中心主义”。